

# 论全球化时代的东亚修辞学教育

[中] 陈汝东\*

## 目 录

- 一、东亚修辞学教育的源流
- 二、东亚修辞学教育的特点
- 三、东亚修辞学教育的现状
- 四、东亚修辞学教育的前瞻

公元前五世纪（465 B. C.），在古希腊的一个殖民小岛上发生了一场民主革命，成立了一个城邦国家，建立了相对民主的社会。“市民”(citizens)被赋予了通过公共演讲和论辩表达个人意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和社会事务处理的权利。<sup>1)</sup> 于是，人们发现了演说和社会功能和其中蕴涵的道理，并使之成为一门学科——修辞学，一门历史悠久、历久弥新的学问。据说，自从科拉克斯（Corax）在西西里开设西方第一门修辞学“课程”之后，修辞学就逐渐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课程，并且形成了一大批职业修辞学教师。<sup>2)</sup> 到中世纪，修辞学已成为西方学校教育的三大课程之一。

在东方，讲究言说的传统同样悠久。在中国，人们通常把“修辞”的历史追溯到孔子所说的“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sup>3)</sup> 不过，这只是迄今发现的文字记载中“修辞”二字最早的出现时间。至于

---

\*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chenrd@pku.edu.cn

1) Thomas M. Conley, *Rhetoric in the European tradi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p. 4.

2) Thomas M. Conley, *Rhetoric in the European tradi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p. 4.

相关修辞论述出现的时间，至少可追溯到春秋(公元前770-公元前476年)时期。孔子在谈到其弟子的课业情况时曾说：“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sup>4)</sup>可见，在孔子的课堂上就出现了“言语”教学。当时的“言语”应算是当时的言语教育，也可以说是修辞教育。但是，中国后世的修辞教育则演变到了诗文写作教育之中，很少涉及西方意义上的公共演说修辞。

无论是古典时期，还是现代时期，东西方的修辞学研究及教育都形成了不同的传统。西方修辞学教育更重视公共演说修辞，东方修辞学则更重视个体写作修辞。如今随着全球政治、经济的一体化和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国际修辞学研究和教育出现了新的格局。亚洲修辞学特别是东亚修辞学逐渐成为国际修辞学舞台上的生力军，而且随着东亚各国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中地位的逐渐增强，西方修辞学研究的目光正在转向东亚。<sup>5)</sup>在此情势下，东亚修辞学教育面临怎样的挑战、该如何发展？是抛弃既有的古老修辞学教育传统，完全接受西方的修辞学教育模式，还是继承和发扬既有的教育传统、自主创新呢？这是本文想试图回答的。

## 一、东亚修辞学教育的源流

东亚的修辞实践源远流长，修辞观念起源于中国，这在相关的学术研究中已被证明。比如日本明治时代的岛村抱月(泷太郎，1871-1918)就认为，日本的“修辞”一词来源于孔子所说的“……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sup>6)</sup>此外，在日

3) 《周易·乾·文言》。

4) 《论语·先进》。

5) 最近几年参加国际修辞学会史学会年会的东亚学者逐渐增多，且该学会已邀请亚洲学者做特邀大会报告(比如第15届、16届年会上就分别邀请了北京大学的陈汝东和高丽大学的田圣淇两位学者做特邀大会报告)。获得该学会首届优秀论文奖的唯一论文是关于中国修辞学的。在该学会2009年7月举行的第17届年会上，增选中国学者陈汝东为新一届理事会理事。这些都表明了东亚修辞学国际影响力的扩大。

6) 岛村泷太郎《新美辞学》，早稻田大学出版部藏版，1902年，第3、2页。

本，修辞学又被称为“美辞学”，这一名称取自曹植《辩道论》中的“温颜以诱之，美辞以导之”。<sup>7)</sup> 当然，这一称谓也受到西方修辞学的影响，特别是17-18世纪英国修辞学的影响，尤其是受修辞学著作*Rhetoric and Belles-lettres*<sup>8)</sup>的影响。<sup>9)</sup>

在韩国，“修辞”(*susa*)一词通常被认为是来源于日本，<sup>10)</sup>而日本的“修辞”是来源于中国的。也有人认为，日本修辞学源于日本僧人空海所编的《文镜秘府论》，但是，即使如此，也说明日本修辞学是源于中国修辞学，因为该著作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六朝至中唐前期的诗文论。由此可见，东亚修辞学是同源的，都是源于中国古代的修辞学。这一点已为学界公认，无论是认为日本修辞学起源于明治时代的，还是来源于中国唐代的。

在后世的发展中，东亚中、日、韩三国的修辞学，互相取长补短、相互促进。比如日本奈良时代空海所编的《文镜秘府论》以及明治时代坪内逍遙、高田早苗、岛村泷太郎等的修辞学著作，都充分吸收借鉴了中国古代的修辞学思想。而龙志泽(伯纯)、陈望道等中国修辞学者，也吸收借鉴了日本修辞学。当然，韩国修辞学在发展中也吸收借鉴了中国和日本的修辞学，<sup>11)</sup>同时也吸收借鉴了西方修辞学。<sup>12)</sup>中、日、韩三国之间修辞学的相互借鉴大致分为三个时

7) 岛村泷太郎《新美辞学》，早稻田大学出版部藏版，1902年，第3、2页。

8) 该书为英国修辞学家Hugh Blair (1718-1800) 所著的*Lectures on rhetoric and belles lettres* (London, W. Strahan, T. Cadell; etc. 1783.)，由菊池大麓翻译成日语《修辞及华文》。所谓“华文”就是“华丽、华美”的意思，也就是“美辞”。“belles-lettres”是法文，翻译成“美文学”或“纯文学”。此外，Adam Smith (1723-1790) 也著有*Lectures on rhetoric and belles letters* (London, New York, T. Nelson, 1963.)。

9) 陈汝东《岛村泷太郎的修辞学思想及其对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影响》，《修辞学论文集》第12集，中国修辞学会编、陈汝东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1-131页。

10) 田圣淇 (JON Sung Gi)，《走向修辞传播学——论韩国修辞学》(Towards a Rhetoric of Communication: an Essay upon Korean Rhetoric)，中国修辞学会2007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天津师范大学，2007年11月7-9日。

11) 田圣淇 (JON Sung Gi)，《走向修辞传播学——论韩国修辞学》；罗敏球《浅述韩国传统修辞学的发展历程》，2009年北京大学国际修辞传播学前沿论坛，北京大学，2009年6月7日。

12) 罗敏球《浅述韩国传统修辞学的发展历程》；朴禹洙 (WooSoo Park)，《代笔韩国：罗伯特·奥利弗及其修辞在韩国建立中的助推作用》(Ghostwriting South Korea:

期：一是汉唐时期，二是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期，三是20世纪中后期至今。

东亚的修辞学教育与东亚的修辞学研究密切相关。在先秦时期，中国的修辞教育，主要以口语修辞为主。无论是孔子的私学教育，还是鬼谷子的私学教育，<sup>13)</sup>都讲授语言技能、语用策略。虽然当时没有称为修辞，但是，其内容相当于现在的修辞。其后的教育内容则多集中在书面语修辞特别是写作修辞，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当代。在中国历史上，“尽管也曾出现过演讲、论辩或说服的多种形态，比如古代朝堂上的奏议、辩论以及农民起义过程中的演讲，抑或是近代民主革命、战争时期以及‘文革’运动中的各种演讲，但是，这种演讲、论辩、说服与古希腊传统上的是有本质差异的。前者解决的是公共意志、公共政策、公共事务之间的关系。后者解决的只是集权社会中的权势主体决策问题，或者公共行为的统一问题，并非公共意志的凝聚、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公共事务的决策问题，尽管其结果也都涉及公共利益，但其出发点并非着眼于公共利益。参与的主体、信息的性质、传播的过程、传播的效果以及传播的机制都是不同的。”<sup>14)</sup>在20世纪中期以前的日本和韩国，情况大致也是同样的。日本修辞学在明治时代接受了西方修辞学中的演说修辞研究传统，引进了许多公共演说修辞学的著作，比如黑岩大译述的《雄辩美辞法》、尾崎行雄翻译的《公会演说法》等，并且也出现了研究演说的修辞学著作。在明治时代初期和后期，也出现了公共演说，演说修辞教育也曾一度成为学校教育的内容；<sup>15)</sup>但是，在日本，这种西方式的公共演说修辞研究及社会实践当时只是昙花一现，虽然后世也偶有演说出现，但并没有形成演说修辞学传统。明治之后，日本的修辞学研究基本回到了书面语修辞。

Robert Oliver and His Rhetorical Midwifery in the Birth of a Nation), 2009年北京  
大学国际修辞传播学前沿论坛, 北京大学, 2009年6月7日。

13) 鬼谷子为战国时期纵横家的创始人，相关记述最早见于西汉司马迁的《史记》，相传鬼谷子著有《鬼谷子》一书。对此书的真伪学界看法不一。

14) 陈汝东《论人类传播秩序——一种比较修辞学视角》，《人类文明中的秩序、公平公正与社会发展》，关世杰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75-585页。

15) Massimiliano Tomasi, *Rhetoric in modern Japan: western influenc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narrative and oratorical styl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c2004, pp. 143, 148, 27.

但是20世纪中叶之后,日本的情况有所改变,因受美国的影响,逐渐形成了公共演讲修辞体制。公共演讲修辞成为公共政治权力建构的一种重要方式,因此,口语修辞能力培养在公共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所改善。韩国的情况有所不同。虽然韩国也受到了美国的影响,但是,韩国的政治体制与日本不同。因此,在二战之后,韩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依然是强权政治,没有形成以公共演说修辞为主要途径的公共权力建构体制。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公共演说修辞才真正发挥社会权力的建构功能,并成为大学教育课程。<sup>16)</sup>

## 二、东亚修辞学教育的特点

### 1、东亚修辞学教育的特点

以上分析表明,与西方修辞学教育相比,东亚的传统修辞学教育呈现出以下特点:

(1) 写作修辞教育占主流。东亚的修辞学教育主要是语言知识和写作技能教育,虽然也培养口语能力。这与西方重视公共演说修辞的传统有所不同;当然,西方修辞教育也并非不重视写作修辞教育,只是更重视公共修辞能力的培养。

(2) 重视个体修辞教育,轻视公共修辞教育。所谓个体修辞,就是修辞者是社会个体实施的以自身利益为主要指向的修辞行为。个体修辞的功能最终虽然也会产生社会功能,但其出发点重在个人利益。公共修辞则是指社会个体或群体以公共利益为指向的修辞行为,其修辞动机在于公共意志表达,公共权力建构和公共政策制定。东亚传统修辞学教育的功能指向偏重个体修辞能力的培

16) 韩国1996年第一次大规模开设修辞学教养课程《修辞学浅谈》,参见罗敏球《韩国的“修辞学教育”与“汉语修辞学教育”现况与展望》,世界汉语修辞学会第一届年会暨修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曲阜师范大学,2008年7月11日-15日。

养，重在提高个体文化素质、道德修养和社会生活能力，即中国传统所说的“修身、齐家”的功能；当然，一定程度上也培养其参与社会政治的能力，即“治国、平天下”的能力；但是，这种参政能力的培养是以个人安身立命为出发点的。西方的传统修辞学教育则主要是以公共修辞功能为指向，即重在培养公众公共意志表达、公共意志凝聚、公共权力赋予、公共政策制定、公共秩序建构和公共事务处理等方面的能力。

(3) 语言教育体制为主。东亚传统修辞学教育的另一个特点是以语言教育体制为主，修辞学归入语言学之列，而不是统属于哲学、伦理学或者独立的学科。在东亚的整个教育体系中，修辞学教育只局限于语文课程或本民族语言学课程。在中国的传统教育中，并没有专门的修辞学课程，日本和韩国也是如此。在中国古代，私学教育中有“言语”教育、诗文写作教育。在现代，修辞只是中小学语文教育中很小的部分，且限于用词、用句特别是修辞格。在日本的明治时代，修辞学教育也只是日语教育特别是文章写作教育的一部分。韩国的情况大致如此。这不同于西方。在西方古典时期，其教育体系中就有独立的修辞学课程；而在当代，西方有的国家是设有修辞学专业或修辞学系的。

## 2、东亚修辞学教育传统的成因

东亚修辞学教育的传统特点，自然与东亚各国的政治、历史、文化具有必然联系，但是也与它们共同的文化渊源密不可分。我们把这种文化渊源上的共性概括为以下两点：

(1) 共同的儒家文化思想影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学说是主流，至少从汉代以后是如此。而在儒家学说的鼻祖孔子的修辞思想中，有“质文”并重、“行言”相协的思想，而且两相比较，“质”、“行”则更为重要，即强调“德”胜于“言”、“行”胜于“言”，<sup>17)</sup> 比如孔子所说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

17) 陈汝东《孔子言语行为思想的道德价值取向》，《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第124-127页；戴磊《论孔子的修辞学思想》，《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彬，然后君子。”<sup>18)</sup> 即使在概括人生追求方面，“言”也是在“德”之后，比如“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sup>19)</sup> 此外，孔子的“慎言”观也是这一思想的反映。因此，我国的修辞学教育多以提高社会个体的文化素质、道德素养为主，而不是以公共言说为主，这与儒家的上述观念具有密切关系。这种修辞学思想，对东亚各国的修辞学教育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有学者认为，日本缺乏西方意义上的演说修辞学，与儒学传统中重行轻言思想的影响也不无关系，<sup>20)</sup> 这是有道理的，但是，中国的修辞学传统中只是更重“行”，但并不轻“言”。

(2) 同样的集权式公共权力建构体制。另一方面的原因是，东亚诸国缺乏公共演说修辞的民主秩序，因为东亚各国的历史主要是集权式公共权力建构体制。“无论是中国的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都是集权社会。整个社会的传播秩序是建立在集权统治基础上的。社会事务、公共政策都是通过集权解决的。民众没有解决社会公共事务的言论自由权利，因此，公共演说也就没有用武之地。所以，当时产生了苏秦、张仪那样的著名修辞家，而没有产生像亚里士多德那样的修辞学家。也就是说，中国的修辞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以集权制度为基础的。它注定不会研究公共演说。”<sup>21)</sup> 与中国相似，古代、近代日本、韩国的社会制度大致如此，也不会产生公共演说修辞，也就不会产生与之相应的修辞学及其教育。因此说，东亚修辞学教育的传统是建立在其社会政治权力建构方式基础上的。这决定了东亚古代修辞学教育的特点。西方则不同。“古希腊修辞学的诞生，来自社会制度的变化。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建立了一个相对民主的社会制度，公民获得了在公共政策制定、利益分配、司法诉讼等方面的言

版) 1995年第4期, 第12-15页。

18) 《论语·雍也》。

19) 叔孙豹语,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20) Massimiliano Tomasi, *Rhetoric in modern Japan: western influenc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narrative and oratorical styl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c2004, pp. 143, 148, 27.

21) 陈汝东、胡成花《东西方修辞学传统的历时比较与思考》，《修辞学习》2008年第5期, 第65-70页。

论自由权利。人们通过公共演说影响、改变决策群体的观念，达成共识，促成公共政策的产生，推动社会发展。于是，一门以演说、论辩技巧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修辞学诞生了。……也就是说，西方修辞学从一开始就是在一种民主制度中兴起的。这种演说修辞学在民主制度建立后的西方又被复兴、发扬、光大。”<sup>22)</sup>可见，西方公共演说修辞学教育传统的基础是公共权力建构的民主体制，而东方修辞学教育传统的基础则是集权式公共权力建构体制。

### 三、东亚修辞学教育的现状

在古代和近现代，东亚修辞学教育虽然重在个体书面语修辞教育，走了一条与西方的公共演说修辞教育传统不同的道路。但是，在当代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和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东亚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逐渐融入国际新秩序。无论是社会制度、政治体制，还是公民社会生活，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影响。东亚各国的修辞学教育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出现了新的态势。

#### 1、东亚修辞学教育的新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韩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美国等西方文化的影响，逐步建立了与西方类似的民主社会制度，公共演说修辞也随之兴起。这种状况在日本政治修辞中更为突出。目前，公共演说修辞已成为其社会政治权力建构的重要途径之一。日本两党的政权选举，更加依赖公共演说修辞。这是东亚修辞实践的一种新形态。但是，这只限于公共政治修辞领域。在公民修辞领域，演说修辞并未成为大众参与政治生活的重要方式。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韩国的政治权

22) 陈汝东、胡成花《东西方修辞学传统的历时比较与思考》，《修辞学习》2008年第5期，第65-70页。



力建构中，尽管其所占比重不大。在当今的中国，公共演说修辞虽然很少，也并非公共权力建构的方式；但是，自从20世纪末期以来，随着新媒体特别是国际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中国的网民开始通过网络自由表达他们对公共政策、公共事务的看法，这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修辞的公共政治功能，而且这种发展态势近年来越发强劲。这些都为东亚修辞学教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东亚的修辞学研究，在最近几年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东亚各国的修辞学研究继续继承发扬各自的学术传统，并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比如中国、<sup>23)</sup>韩国都已经成立了修辞学会，并经常举行各种形式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吸引西方的修辞学学者参与，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促动了东西方的交流与合作。其次，东亚的修辞学者积极参与国际修辞学界的交流与互动，继续借鉴、吸收西方的研究成果。比如，最近几年，中国、韩国、日本等的修辞学学者积极参加国际修辞学史学会等国际学术组织的学术会议，其学术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扩大。再次，在美国、英国、法国等西方国家学习修辞学的东亚学子也逐渐增多，有些已经学成回国，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学术成果。这些都增进了东西修辞学研究之间的交流，同时也促进了东亚修辞学教育的发展。20世纪末期以来，中国的修辞学教育已不再局限于语言学学科，而是向新闻学、传播学等学科渗透。其教学内容，也逐渐由传统的书面语修辞向大众传播特别是新媒体修辞扩展，比如大众传播修辞、新闻修辞、播音修辞、广告修辞、网络修辞等。在韩国和日本，虽然公共演说修辞教育依然不多，但是，公共修辞能力培养的意识以及修辞学教育的规模已有一定的改善，修辞学教育在公共领域中的影响逐渐扩大。

## 2、东亚修辞学教育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当然，当代东亚的修辞学研究和教育也存在许多问题和挑战。我们把它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23) 1980年成立的中国修辞学是我国修辞学领域最大的全国性学术组织。2007年于法国成立的世界汉语修辞学会是目前最大的汉语修辞学研究国际学术组织。

(1) 如何继承和发扬自己的传统。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发展, 在近年的东亚修辞学研究中, 出现了不同程度重视西方修辞学、忽视本国民族修辞学传统的情况, 虽然各国本民族的修辞学研究依然占主流, 但是, 毋庸置疑, 东亚西方修辞学研究的比重正在呈上升态势, 这在日本修辞学界比较明显。<sup>24)</sup> 这种情况也不同程度地反映到了东亚修辞学教育中。因此, 各国都不同程度地面临如何继承发扬各自修辞学教育传统的问题。

(2) 如何应对国际修辞学发展的新态势。目前国际修辞学研究的交叉、融合趋势在不断加强, 各国学者的交流合作频率在不断增加。但是, 毫无疑问, 其中对西方古典修辞学研究的比重依然很高。因此, 东亚各国学者也同样面临一个如何应对国际修辞学研究趋势的问题。在学术文化融合的今天, 东亚各国学者如何保持和发扬既有的汉字文化圈所固有的学术研究和教育传统, 同时又不使之成为自身发展的藩篱, 是东亚各国修辞学研究和教育面临的挑战之一。

(3) 如何处理修辞学教育的学科归属。在既有的学术传统中, 修辞学通常被归入语言学范畴, 这与西方的修辞学研究及教育传统有很大不同。在国际修辞学交流中, 东亚的传统修辞学往往被认为是技术性的, 缺乏哲理性, 很少思考人的理性、情感、逻辑、自由和权利等问题。因此, 东亚修辞学多被看作语言知识课程, 而不是具有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性质的课程。但是, 最近几年随着传播学的崛起, 这种既有的态势有所扭转。修辞学教育的归属问题, 是否应该重新定位, 是否应该借鉴西方的模式, 是东亚修辞学教育发展面临的挑战之一。实际上, 有的学者早已在思考修辞学教育的学科建制及其归属问题。<sup>25)</sup>

(4) 如何处理修辞学教育与各国修辞秩序之间的关系。显然, 东亚的修辞学研究和教育传统是建立在各国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基础上的。虽然东亚各

24) 2006年笔者作为嘉宾应邀出席日本传播学会年会, 会上有些日本学者对日本修辞学者忽视本国修辞学传统的现象提出了批评。日本的青年修辞学者多留学自欧美, 很少关顾日本明治时代的修辞学传统。

25) 陈汝东《中国修辞学: 20世纪回顾与21世纪展望》, 《平顶山师专学报》2001年第3期, 第51-56页; 《论以修辞学为中心的学科体系建设》,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第94-99页。

国历史上缺少公共演说修辞的传统，现在依然延续着重视德行修养、重视个体书面修辞的传统，但是，随着全球化态势的发展和新媒体技术的推广，公共演说修辞教育已成为一种社会发展趋势。既有的个体书面语修辞教育，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因为公共民主权利秩序的建立和维护，社会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与监督，公共事务的处理，以及社会公平公正的维护，都需要社会个体意志的自由表达和公共意志的凝聚，而这些必须通过建立公共修辞秩序来实现，必须通过公共修辞实践和公共修辞教育来实现。所以，东亚的修辞学教育要思考如何面对新媒体公共修辞秩序建构的挑战。

#### 四、东亚修辞学教育的前瞻

在全球化、新媒体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东亚的修辞学教育应该如何发展？这值得引起东亚修辞学学者的重视和研究。我们认为，在新形势下，东亚修辞学教育需要考虑以下发展方向：

##### 1、坚持既有的区域学术传统

在全球化进一步加深的今天，东亚各国是否需要继承和发扬各自的学术文化传统，特别是继承和发扬东亚修辞学共有的学术传统以及教育传统呢？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是保持亚洲汉字文化圈学术文化传统的必然选择。重视个体书面语修辞能力的培养，秉持“行胜于言”的教育理念，强调修辞的伦理功能及其在个人政治生活以及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重视文章写作修辞等等，都值得继续继承和发扬。与此同时，采取“西为东用”的策略，积极参与国际修辞学的互动与交融。显然，东亚的学者已注意到了东西方修辞学交融的重要性，并且已在国际修辞学学术舞台上崭露头角，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为东西方的进一步互动交流创造了条件，使西方学

者看到了东亚悠久的修辞学传统和在新世纪的蓬勃生气。这从客观上增强了东亚修辞学教育对自身传统承袭的信心和力量。

## 2、从个体修辞教育走向公共修辞教育

东亚修辞学的传统，并不能完全适应全球和东亚发展的新形势，尽管东亚修辞学教育中强调个体修辞能力培养的个性化教育具有一定的文化优势。在全球化和新媒体环境下，东亚各国的民主制度进一步完善。公共权力的建构、公共政策制定、公共事务处理呈现出越来越重视公共意志表达和体现的趋势。此外，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也为民众自由意志表达权利的实施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这些都需要培养公众的公共修辞能力、素养和自觉意识。因此，从个体修辞教育走向公共修辞教育已成为大势所趋。东亚修辞学教育应改革传统单纯的社会个体语言能力特别是书面语运用能力的培养范式，加强对社会个体表达公共意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公共事务决策能力的培养，提高公共演说修辞能力，即由个体修辞教育走向公共修辞教育，由个人技能教育走公共职能教育。这不仅是东亚修辞学教育的发展需要，也是东亚公共修辞实践发展的需要。

## 3、从传统媒体修辞教育走向新媒体修辞教育

传统的修辞学教育多以自然语言的平面媒体修辞为主，很少涉及电视、手机、网络等新媒体修辞。但是，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使公众修辞介质发生了变化，同时产生了许多新的语言变体和新的修辞现象，也促成了新的修辞社会秩序。这促使修辞学研究关注新媒体修辞，也促使修辞学教育由传统媒体修辞向新媒体修辞的转化，东亚修辞学研究及其教育也不例外。东亚修辞学教育的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教育主体，都应向新媒体传播领域发展。这代表了东亚修辞学教育未来的发展方向。

#### 4、从语言学教育走向传播学教育

在东亚传统的修辞观念中，修辞首先是语言的，是关于选词、择句、用格的写作技巧的，修辞学及其教育首先归属于语言学范畴，汉语修辞学则归属于汉语语言学范畴。在西方则不同，提到“修辞”，人们首先想到的则是“演说术”（oratory）；当然，还有“有效的演说策略”、“语言运用”、“说服”、“语言说服效果”、“修辞格”等等。<sup>26)</sup> 但是，西方的修辞学并不在语言学学科下面，而是独立的专业或学科。随着修辞学研究的不断深化和相邻新兴学科特别是传播学的发展，东亚修辞学学科性质及修辞学教育的体制也在发生变化。人们对修辞属性的认识也在加深。修辞既“是人类的一种以语言为主要媒介的符号交际行为，是人们依据具体的语境，有意识、有目的地建构话语和理解话语以及其他文本，以取得理想的交际效果的一种社会行为”，<sup>27)</sup> 同时也“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以取得理想的交际效果为指向的传播行为”。<sup>28)</sup> 这种修辞观导致了修辞学研究新范式和修辞学教育新范畴的出现和发展。东亚修辞学教育正在逐渐由语言学教育范畴向传播学教育范畴演变和转化。在中国，修辞学教育目前已逐渐由传统的中文院系转向传播学院系。这同时也意味着修辞学传统学科属性范畴的转变。与此相应的是，修辞学教育的学科建制也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趋势意味着修辞学专业的建立和修辞学系建制的出现将成为一种可能。<sup>29)</sup> 实际上，这在西方发达国家，早已成为一种现实。以上这些均反映了东亚修辞学教育发展的新方向。

26) *The Rhetorical Tradition: Readings from Classical Times to the Present*, edited by Patricia Bizzell, Bruce Herzberg, 2nd ed., Boston: Bedford/St. Martin's, c2001, p. 1.

27) 陈汝东《当代汉语修辞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7页。

28) 陈汝东《论修辞研究的传播学视角》，《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第90-91页。

29) 陈汝东《中国修辞学：20世纪回顾与21世纪展望》，《平顶山师专学报》2001年第3期，第51-56页；《论以修辞学为中心的学科体系建设》，《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第94-99页。

综上所述, 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 东亚的修辞学教育形成了自己的传统, 并在不同的时代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以语言学教育为范畴, 以个体修辞能力培养为理念, 强调书面语文章修辞, 突出“行胜于言”的修辞伦理思想, 缺少公共演说修辞秩序等等, 都是东亚修辞学的特点。这种修辞及其教育传统的形成与儒家思想的影响、汉字文化圈氛围以及相应的社会权力秩序建构体制, 都是密切相关的。随着全球政治、经济的一体化和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与普及, 修辞学教育的全球化进程也在加速。在此形势下, 积极参与国际修辞学界的互动与融合, 坚持各自既有的学术传统, 从个体修辞教育走向公共修辞教育, 由个人技能教育走公共职能教育, 从传统媒体修辞教育走向新媒体修辞教育, 从语言修辞教育走向传播修辞教育, 逐渐形成修辞学教育的新学科建制, 已成为东亚区域修辞学教育发展的新趋势。

## 参考书目

- 《周易·乾·文言》  
《论语·先进》  
《论语·雍也》  
叔孙豹语,《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岛村泷太郎,《新美辞学》,早稻田大学出版部藏版,1902年  
陈汝东《当代汉语修辞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陈汝东,《岛村泷太郎的修辞学思想及其对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影响》,《修辞学论文集》第12集,中国修辞学会编、陈汝东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  
陈汝东,《论人类传播秩序——一种比较修辞学视角》,《人类文明中的秩序、公平公正与社会发展》,关世杰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戴磊,《论孔子的修辞学思想》,《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 第4期  
陈汝东,《孔子言语行为思想的道德价值取向》,《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 第1期  
陈汝东《中国修辞学:20世纪回顾与21世纪展望》,《平顶山师专学报》,2001年 第3期  
陈汝东《论修辞研究的传播学视角》,《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 第2期  
陈汝东,《论以修辞学为中心的学科体系建设》,《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 第1期  
陈汝东、胡成花,《东西方修辞学传统的历时比较与思考》,《修辞学习》,2008年 第5期  
Thomas M. Conley, *Rhetoric in the European tradi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p.4.  
Massimiliano Tomasi, *Rhetoric in modern Japan: western influenc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narrative and oratorical styl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c2004, pp.143, 148, 27.

*The Rhetorical Tradition: Readings from Classical Times to the Present.*

edited by Patricia Bizzell, Bruce Herzberg, 2nd ed., Boston: Bedford/St. Martin's, c2001,p.1.

田圣洪 (JON Sung Gi), 《走向修辞传播学——论韩国修辞学》(Towards a Rhetoric of Communication: an Essay upon Korean Rhetoric), 中国修辞学会2007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天津师范大学, 2007年11月7-9日

田圣洪 (JON Sung Gi), 《走向修辞传播学——论韩国修辞学》; 罗敏球《浅述韩国传统修辞学的发展历程》, 2009年北京大学国际修辞传播学前沿论坛, 北京大学, 2009年6月7日。

罗敏球, 《浅述韩国传统修辞学的发展历程》; 朴禹洙 (WooSoo Park), 《代笔韩国: 罗伯特·奥利弗及其修辞在韩国建立中的助推作用》(Ghostwriting South Korea: Robert Oliver and His Rhetorical Midwifery in the Birth of a Nation), 2009年北京大学国际修辞传播学前沿论坛, 北京大学, 2009年6月7日。

韩国1996年第一次大规模开设修辞学教养课程《修辞学浅谈》, 参见罗敏球《韩国的“修辞学教育”与“汉语修辞学教育”现况与展望》, 世界汉语修辞学会第一届年会暨修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曲阜师范大学, 2008年7月11日-15日。



<Abstract>

## On Rhetoric Education in the Eastern Asia at the Globalization Time

Ru-dong Chen

As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in politics, economy and new media technology, the globalization speed of academic culture accelerates also. In the current states, the inheriting and carrying forward of regional academic culture becomes a new academic topic gradually. So does rhetoric research and its education. As one important part of the world civilization, the eastern Asian rhetoric and its education formed its own long history and special tradition. At the globalization time, how does the eastern Asian rhetoric develop? What education concept should it follow? What challenges will it encounter? What is its developing currents? Should our own tradition be kept up to or be given up? All these problems should be considered by the eastern Asian rhetoric scholars. From this poin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hetoric educational tradition in eastern Asia by reviewing and compares briefly the eastern Asian and occidental rhetoric history, analyzes the current states and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rhetoric education in eastern Asia, puts forward the developing tendency for the rhetoric education in eastern Asia in the new media and globalization time.

Key Words : globalization, new media, rhetoric education, eastern Asia, developing tendency

투 고 일 : 2010. 1. 10. / 심 사 일 : 2010. 1. 15. ~ 2010. 2. 10. / 게재확정일 : 2010. 2. 15.